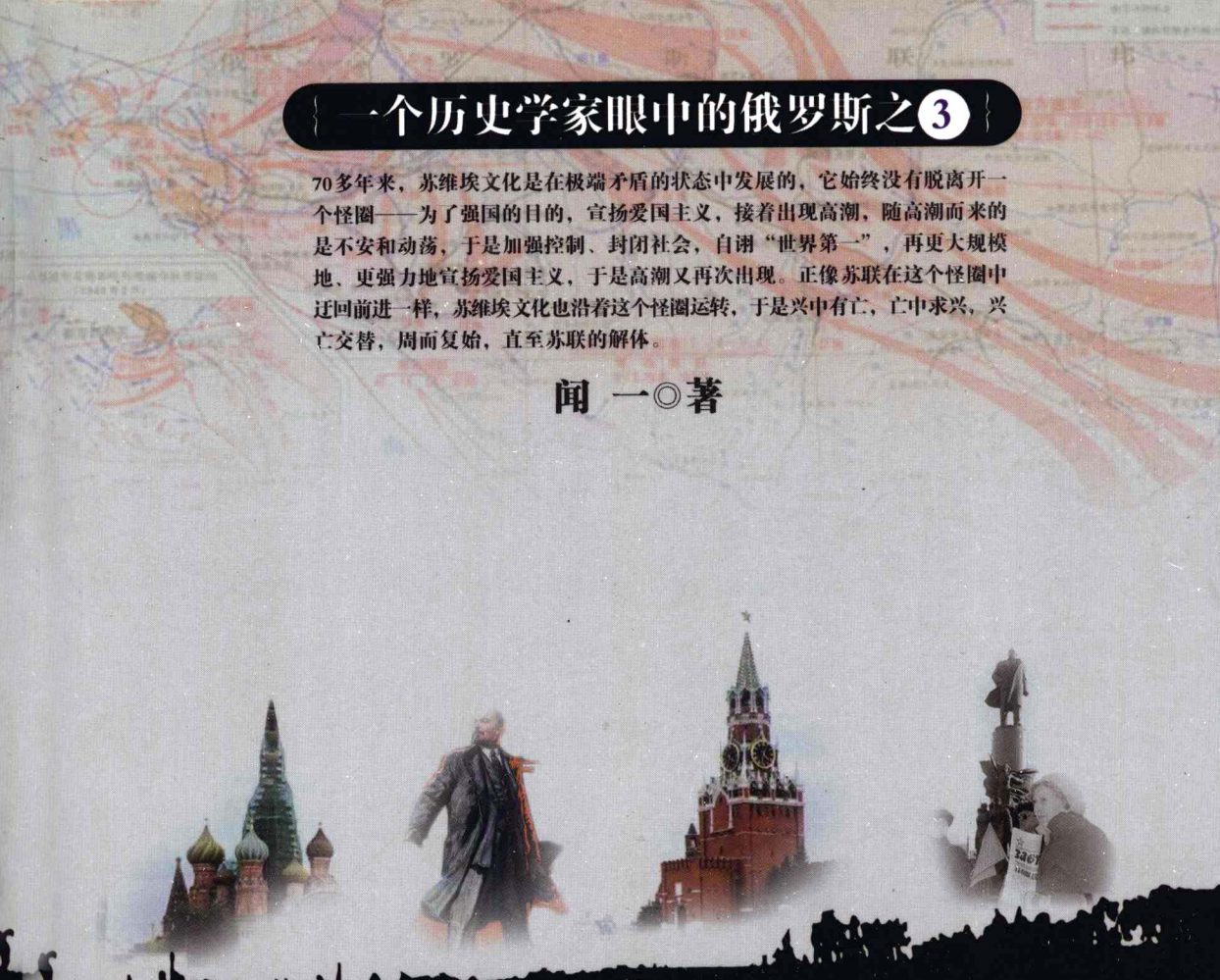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③

70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一个怪圈——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闻一◎著



苏维埃

SUWEI AI
WENHUA XIANXIANG SUI BI

文化现象随笔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 3

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乱。
怪圈——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闻 一◎著



苏维埃

SUWEI AI
WENHUA XIANXIANG SUIBI

文化现象随笔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闻一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6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 3)

ISBN 7 - 210 - 03375 - 0

I. 苏... II. 闻... III. 文化史 - 研究 - 苏联

IV. K512.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5814 号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三:

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

闻一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50 千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 - 210 - 03375 - 0/K · 434 定价: 24.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序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发展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俄罗斯的历史是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全交织在上演这出壮阔戏剧的人物的思维、言语和行动中;这种扑朔迷离、五彩缤纷齐集于推进这种种声威俱下的事件的运筹、决策和实现里。无论是人物,无论是事件,它们总是那样声情并茂,勃发于天马行空之势,通行于凯歌冲锋之阵,即使消匿,也消匿于壮怀激烈之色。

因此,一部俄罗斯史,一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本来也就应该是声情并茂、五彩缤纷的。它应该有活的人、活的思维、活的行动、活的事件的自始至终的全过程,或者说,在我们后人复述、再现这一历史时,千年的人和事应该活在我们的文字语言里,应该活在我们的思维、推理和结论之中。而遗憾的是,我们有不少对俄罗斯历史的复述和再现的文字却是枯燥的、贫瘠的。其所以枯燥,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只有一些被精制得尺寸分明的条条框框,只有一些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词语口号;其所以贫瘠,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除了预先想好的或者被预先规定出的结论外,就是不厌其烦的引语,领袖的话、前人的话、权威的话、他人的话,而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结论。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论著全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来制作了。先定下几个结论性的意见,再用政策方针来做基础,最后去筛选一些或者拼凑一些历史事实来填补几个结论间的空间。于是,一部浩然大作就成了。在一些人看来,不这样作文,不这样做历史,就是不严肃的,历史嘛,就是为了总结经验,就是为了教训人的。于是,历史就变得森严起来,历史就成了厚厚的一叠纸上的空话,历史成了工具、手段、指示、命令,甚至仕途的台阶,成了所有可能成为的一切而偏偏就不是历史的东西。

历史论著的长短本不是一种表明这种论著科学性高低、贡献性大小的标准。可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些死规定:5000个中文字以下的文字不能算论文,描写了人物和情节的文字不算科学,而叫做“通俗文章”。甚至,权威学者们还要

花费无数的精力来界定这种“通俗文章”，什么是“通俗文章”，什么人去写“通俗文章”。而一切界定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界定，就是“通俗文章”是不能作为科学考核的依据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厌烦了这种森严的、只有结论的历史。1997年，早在《走近俄罗斯》一书的序言中我就写过：“不知为什么现在的史学文章写得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没有文采，越来越叫人不耐烦去读。我自己的史学文章也是这样。似乎还有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写得有趣的、生动的、有文采的，常常被冠以‘普及读物’的好听名称，而被打入史学文章的另册。一些史学同行宁肯被大块大块的史学文章憋死，也不愿屈尊于‘普及读物’的‘雕虫小技’，期盼着有朝一日史学家的尊号落到头顶时不会为往昔的平庸而羞愧。而我喜欢色彩和情趣，希望史学和文学的融合。”我也喜欢平凡，喜欢平庸。不过，这句话在那时我没有写。

从《走近俄罗斯》起，我便离开森严和神圣，走上了一条平凡的、平庸的、被许多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史学研究和写作道路。10年过去了，用得上一句老话，岁月如飞。我不再写那些严肃的论著，所谓严肃，我一是指那些什么可写什么不能写的界定，二是指那些先验性的条条框框，三是指那些烦琐的注释，那些比论著本身都要长出去许多倍的、表明自己知识是如何渊博、资料是如何可靠、引证是如何权威的注释。当然，我并不是笼统地不写论文，我只写我根据历史事实必须写的东西，我只写令我不写则不能心静的东西，我不再用那些庞大的、几乎要吓死人的注释体系去烦扰读者。收集在这套书里的论文集《凯歌悲壮》就证明了我既在森严的、神圣的“学院派”氛围中从事过不通俗的研究，也证明了我从这个氛围中的走出。而我可以告慰我的读者的是，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系列论文中虽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我写的是真话，我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真相。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说，现在还想说的是，历史论著不能板着面孔，因为历史本身就不板着面孔。历史需要活的气息，需要活力，需要色彩，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走出北高加索》是一本试图用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来描述北高加索和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的书。在这个我用形象、感情、甚至呼号和悲叹的文字组成的书中，一切都是跳跃的、波动的、变幻的，一切都有各自的形象。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它们都穿越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它们都飞腾在苍穹和大地之间，它们都思考在存在和否定之间。我要说的是，《走出北高加索》不是纯粹的游记，也不是好事的文人们所宣扬的“行走文学”，尽管读者可以在这些文字里看到山山水水，有目的愉悦，有耳的声响，有心的情感。

任何历史都有可以颂扬的一面，也有需要评析，甚至否定的一面。颂扬是为了历史的前进，而评析和否定也是为了历史的前进。没有只在一片颂扬声中的

历史,也没有因为评析和否定就会颠倒了历史,并进而会将历史前进的方向引向歧途的事。苏联的历史同样是这样。我在《回眸苏联》一书中说过:“过去,人们对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的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苏联解体的恰恰不是苏联的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尤其是当这个庞然大国已经不复存在时,尤其是在当俄罗斯已在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时,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仅仅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苏联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反’之不识,又何以识‘正’?‘反’之不除,又何以求‘正’?人们总是喜欢‘正’,而忌讳‘反’。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偏偏是要在‘正’、‘反’之中求真理。”

在《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应该说我全是探讨的苏联的历史之“反”。我的着眼点就首先在于探究“反”中的恶,并试图从这种近乎无情的反思中寻求到一种历史如何不再坠入此“反”中,不再为此“恶”所左右的实质。因此,这本书的文字是犀利的,甚至不仅仅是批评和批判,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抨击性质。现在,人们已经不习惯“抨击”这个词,似乎它只能是用于否定的意义上。但是,我觉得,对于历史前进过程中的那些“反”、那些“恶”,即使是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也需要抨击。因此,这本书中的文字更近乎杂文,但是它们都是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的。同样,现在人们也不大愿意说杂文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需要歌颂,也不需要揭露,因此唇枪舌剑的杂文应该被淘汰。而我说,为了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为了历史的前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杂文的。

《走出北高加索》延伸了我在《走近俄罗斯》《俄罗斯大特写》《重返莫斯科》和《绝色,俄罗斯》中对色彩、文采的追求。它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文字描述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则继续了我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中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追求,它同样也在色彩和文采上尽可能地下了工夫。总之,我从多方面考察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这个多方面融合了“学院派”的严肃、学者的探求、文人的情意,甚至还有旅游观光者的闲适和安逸、酒后茶余的侃侃而谈。于是,所有这些文字就组成了我眼中的俄罗斯,一个较之单纯的论著要多彩得多、丰富得多、趣味得多的俄罗斯。而这个俄罗斯,我认为确是一个现实的俄罗斯,一个我们需要去更深入了解的俄罗斯。

我将继续我的对色彩和文采的追求,我将继续我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对俄罗斯的考察。同样,我也将继续我的平凡,我的平庸,我的被一些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研究和写作的道路。

闻 一

2006年春花烂漫时于北京南横陋室

序：苏维埃文化现象

苏维埃文化是苏联存在的 70 多年间兴起、发展并最后归于消沉的文化。它是独特的，其独特性就在于，它源于十月革命的炮声，延伸于内战的硝烟，迸发于集体化和工业化的高潮，高昂于决战法西斯的号角，踟躅于石油天然气的涌出，终结于“解冻”和“改革”的进程。苏维埃文化具有苏联存在时期的全部特色。

苏维埃文化是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区的、民心民意的，最后还有领导者的愿望和决策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苏维埃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苏联是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信仰非一的国家。每个地域、每个民族、每种信仰都有自己经历了漫长发展和存在的习俗、操守、礼仪、伦理、道德、传统——文化。而这些文化在其发展水平上又有着极大的差距，当人们在中央地区追寻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进程时，在边远的北高加索山区和远离莫斯科的北方沿海及东部广袤草原上，还存在着血亲复仇的社会和没有文字的部族；当人们竭尽全力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号令一切的中央政权时，那种自治的、自主的、甚至独立、分裂的现象却此起彼伏；当执政者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一统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行为时，东正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天主教的，甚至还只有膜拜对象的原始信仰的传播、影响和被崇奉却历经起伏而不衰。70 年间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内战、灾荒、瘟疫、外族的入侵、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社会的封闭以及影响愈来愈强烈的外部世界的干预，又促使这种复杂的、多样的苏维埃文化处于一种多变的发展曲线之中。

苏维埃文化有着双重性，它一方面倡导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基本出发点，号召人们在最短时期内、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从上而下的宣传和鼓动是倡导和建立这种苏维埃文化的主要手段，寻找、树立和推广“榜样的力量”则是苏维埃文化从无到有的一根红线。所以，一切文艺形式中，一切文化样式中，正面的、无缺点和问题的、英雄的人物就是光辉的主人公，而社会则划分为两

极,阶级决斗为两个阵营,意识形态也绝对的敌我相向、水火不容。由是产生了苏维埃文化的另一重属性:它对执政者和最高权力的绝对依附和服从。一切必须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爱社会主义和崇奉国际主义,就得爱和崇奉苏联及其社会制度,而爱和崇奉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就得爱和崇奉这个国家的领袖并跟随他们亦步亦趋。苏维埃文化的第一重性由于苏联国人对摆脱穷困的急切需求和对未来光明社会的热烈向往,在现实中屡屡引发起建设的激情和高潮。普通人们在直接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粉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和超级大国的形成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爱国热情。那种由文化创造和体现出的英雄人物成了一股鼓舞人们去忘我劳动、热血战斗、无畏牺牲,向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和理想的高峰冲击和攀登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在这种苏维埃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人们所以能作出奉献、流淌汗水,甚至牺牲,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苏维埃文化所揭示的美好未来和领袖们对这种美好未来的许诺是一定会很快实现的。

而苏维埃文化的另一重性,由于执政者所宣传、鼓动和许诺的美好未来没有很快变成现实或者根本没有成为现实,由于人们在勒紧裤带后没有享受到应得的生活的改善和生存的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也就不安和动荡。而这种种不安和动荡经过曲折折的传递和上达,最终就演化成为对最高权力的挑战和最高领袖的反动,那些演绎着这些不安和动荡的人们,尤其是他们中的突出者就被指责为是“叛徒”、“间谍”和“人民之敌”并进而受到惩处和镇压。“党内斗争”、“大清洗”和对少数民族的迁徙与镇压等就全面地、细微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于是,苏维埃文化所表现和歌颂的就是以红色水兵、带枪的人、“契卡”和“克格勃”为表征的“血与火”的“红色恐怖”,以“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为红线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文化的建立首先是从破坏旧有的一切文化开始的。旧有的一切文化都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有苏维埃文化是最先进的、最具生命力的。荡涤旧有的一切是建立苏维埃新文化的前提和肇始。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罗斯土地上所形成和存在的文化:习俗、操守、礼仪、伦理、道德、传统,都被认为应该消除之,而一切文化样式:书籍的、戏剧的、绘画的、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教会的……都被冠以沙皇的、贵族的、反动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样。这种破坏,这种荡涤是以物质的摧毁和人的失落与死亡为代价的。人们试图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苏维埃文化。破坏和动荡导致了反抗和争夺,从而不得不加强自上而下的专政和统治。因此,也就有了清洗资产阶级专家、“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和实际进程。

苏维埃文化的建立自有劳动者的心愿、希望和理想,但更多的、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领导者的决策和引导。在 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的心愿、希望和

理想与领导者的决策和引导,是在一个十分矛盾而又一统的过程中存在并发展的。共同的行动就是建立一个强国,因而爱国主义,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国爱国主义就成了上下两方面共同的语言。苏联的发展史表明,国力强大和国运兴盛时,也正是这种共同语言——爱国主义发挥作用之时,这时苏维埃文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就深达各个居民阶层,苏维埃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就很壮观。在短暂的70多年中,苏维埃文化一统天下最鼎盛的是两个时期,一是“乱世”,即卫国战争期间,二是“盛世”,即石油天然气高产出的时期。而当国力不继和国运衰微时,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就会加深,并日复一日地形成难以愈合的鸿沟。这时,苏维埃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阻力,一种矛盾深化的诱发点。对爱国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就愈来愈以“苏联第一”或者“苏联唯一”为主要标尺,这成了这时期苏维埃文化的最强音。但是,这种“苏联第一”或者“苏联唯一”的宣传和鼓动是以封闭社会、堵塞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视听和接触、使苏联隔绝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之外为代价的。其结果是,本想以这种“苏联第一”、“苏联唯一”的爱国主义来激励人们的热情和干劲,强化对民众和国家的治理,最后却导致了民众对最高权威和权力的信任的日趋下降和民心的日趋不稳。

苏联的历史表明,苏维埃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文化的过程,是把一个多种文化的国家变为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或者是一种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集中和统领的过程。但是,苏维埃文化建立的过程从其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这种文化是建立在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其进程中,俄罗斯文化渗透、融合和同化其他文化的现象与行为层出不穷。在许多的方面,苏维埃文化在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落后地区的建立是以俄罗斯民族“施舍恩赐”的态度、以行政命令和强力的方式推进的。其他民族的心理、愿望和行为是很少得到考虑的,唯一的标准是诸如农业全盘集体化、直接工业化、优先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大清洗”这样的来自中央的统一的决策和措施。当然,苏维埃文化在试图影响和融合对他国人民的思维和观点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俄罗斯恩赐精神和苏联大国的领导意识。

苏维埃文化最终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民族——“苏维埃人”。“苏维埃人”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品质,其精神的神圣性、思维的创造性、言行的榜样性和力量的无比性都是人类的楷模。这种“苏维埃人”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是全世界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苏联的“乱世”和“盛世”,都曾大力宣传与推广过“榜样的力量”的人物,而他们就是“苏维埃人”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苏维埃人”在苏联最终也未能建立起来,其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必然是“苏维埃人”所要依存的苏维埃文化最终没有能建立起来。

苏维埃文化既有着倡导爱国主义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但又有着削

弱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消极因素。70 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一个怪圈——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苏维埃文化的研究和分析需要宏论巨篇,以苏维埃文化的一些具体现象为议论的随笔只不过是小品。但是,从那些世人先前不曾见过的文字材料和发黄的档案来剖析更深层次的事物,也许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 闻 一

2006 年盛夏于北京南横陋室

目录

序：苏维埃文化现象/1

“苏联第一”/1

“苏维埃爱国主义”/3

“苏维埃宫”为什么没有建造起来？/11

“大莫斯科”的背后/19

酒中乾坤/27

伏特加酒，独特的文化符号/29

饮不尽的“克瓦斯”/37

饮宴与馈赠/45

喊声“乌拉”/53

“乌拉”，苏维埃文化的特色表述/55

剥夺，一个永恒的文化信念/63

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71

往事难如烟/80

重现“斯大林格勒”/87

“预防杀人”/95

苏维埃文化观决定了苏联的历史进程/97

“预防杀人”和普遍告密/105

“大清洗”的文化透析/113

再说“大清洗”/120

究竟是谁最先否定了“大清洗”？/126

“叶若夫现象”/135

清洗头脑/145

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上)/147

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下)/153

“要有一本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上)/158

“要有一本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下)/164

“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170

如此荣誉/177

“荣誉法庭”——布尔什维克荣誉而战/179

“荣誉法庭”——为苏维埃爱国主义而战/188

跋/197

总跋/199

“ 苏 联 第 一 ”



“苏维埃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是苏维埃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之一。自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有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在凯歌行进的那些年代,“为苏维埃而战”成为生活唯一的准则。“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内容就涵盖了一切:打击武装入侵者,为了苏维埃;武装征集余粮,为了苏维埃;实施新经济政策,为了苏维埃;镇压富农的反抗,为了苏维埃;全力高速发展军事工业,为了苏维埃……总之,在为了苏维埃的旗帜下可以做一切事情,做一切事情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苏维埃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爱和忠于苏维埃,爱和忠于苏维埃政权,爱和忠于苏维埃所执行的政策和一切措施,爱和忠于苏维埃机构及其掌权人员。“苏维埃爱国主义”就具有了极强的、极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因此,这种爱国主义就和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完全一样。对自己土地、民族、国家的爱是不变的,而对于作为一种象征的政权的爱却是有许多变数的。在苏维埃政权一切努力与全民族的愿望和利益相一致时,“苏维埃爱国主义”就可以包容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而当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与全民族的愿望和利益相矛盾,甚至相背离时,“苏维埃爱国主义”就会和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相矛盾,甚至相背离。这时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就会发生偏离,误导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在民众中激起一种非正常的、但被宣传为是真正爱国主义的狂热躁动情绪。

1920年4月,苏俄和波兰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首先是波兰的执政者在大波兰民族主义的旗下,兵发基辅。这被列宁确认为是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武装干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全体公民呼吁,绝不允许波兰地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俄罗斯人民。列宁还亲自给开往波兰前线的士兵讲话:“我们今天大家都应当在这里宣誓,提出庄严的保证:我们大家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绝不让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得逞。”此后,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一股战胜波



光荣,红军! (宣传画)

兰地主和资本家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热潮。统兵西进的图哈切夫斯基还发出命令：“我们的刀尖上携带着给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前进！向华沙！向柏林！”列宁本以为依靠这种近乎全民动员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就能击垮波兰，并且能进而将革命输出到国界以外的土地上去，变波兰、德国等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军取得一些胜利后，列宁高兴地说：“我军逼近华沙城下，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列宁和苏维埃的领导人本以为，波兰人、华沙人将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来欢迎苏维埃红军部队，但是，波兰人给红军以沉重打击，苏俄波兰战争的结果却是苏军惨败华沙城下。

将近一年后，即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才承认，在苏波战争中犯了错误。他说：“犯这种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这种力量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爱国主义感情（对波兰战争甚至激起了那些完全非无产阶级的、丝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不是无条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时应当说是根本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爱国主义感情），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太复杂了。但事实是，在对波战争中，我们犯了一定的错误。”列宁在这里回避了对爱国主义的进一步分析，把导致对波战争失败的一种因素——爱国主义归结为是“非无产阶级的”，但是这种热潮般的爱国主义毕竟是在政府的命令和领导者的鼓动下出现的。苏波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激起了苏维埃国家普遍的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而对波战争的失败也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俄罗斯土地上抬头的（或者说复活的）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所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

苏维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鼓动和制造成为唯一一种爱国主义，将这种爱国主义凌驾于一切感情和信念之上，使人们误以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和动力。

因此,也就在事实上将一些本不是爱国主义的、也不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精髓的东西点缀、装饰成“真正的爱国主义”。比如,在当年描述苏波战争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对挥舞着马刀、在波兰土地上呼啸而过的骑兵队英勇奋战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就混杂着这种“爱国主义”,这种“非无产阶级的”,实质上是“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东西。因此,无论对真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也无论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来说,这些点缀的、装饰的、混杂的“爱国主义”是伪装下的爱国主义,伪爱国主义,而其本质就是民族沙文主义。

在其后苏联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苏维埃爱国主义中的这种伪爱国主义成分不断扩展和延伸。对外发展成为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内膨胀为集权主义、领袖个人至上主义和对领袖的极度的歌功颂德。在那些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中,对领袖的歌颂、对领袖在英雄和英雄行为中的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指导和决定作用的赞美,就成为评判一切文化样式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因而,那种对领袖赞美的爱国主义就成为苏维埃文化的一个标志。苏联历史上对李森科的宣传、赞美和推崇成了这种标志中的一个顶峰。如果不说李森科是个伪科学家的话,那他至少是一个科学之途上的投机取巧者、趋炎附势者,一个打击真正科学家并在这种打击中逐步爬到斯大林身旁的人。他的登峰造极并不在于他是农业科学的真正权威和提出的“春化理论”,更不在于他是“进步生物学派”、“米丘林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创立者,而在于他打着“春化”的旗子,向斯大林保证,用他的这种方法种庄稼,就能丰产丰收。李森科的这种“保证”从“科学”上论证了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的正确和英明,这正是苏联领导人试图以“集体化”之路将苏联农业引出困境所迫切需要的。李森科的飞腾还在于他当着斯大林的面说,“春化”的科研战线上也有富农,也有阶级斗争。这在拥护和支持“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年代,在那个以展开对富农的斗争来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的年代,这在以这一切为“苏维埃爱国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岁月,是何等的重要与关键。但是,李森科和他的“科学”并没有将苏联农业引出困境,反而将许多有可能将苏联农业引出困境的真正科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土壤学家等等,打成了“人民的敌人”,使他们坠入地狱,永不能翻身。

李森科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但却同时又是渗透了“苏维埃爱国主义”中伪爱国主义成分的文化现象。伪爱国主义造就了伪科学家、伪学者、伪国务活动家,而这些伪科学家、伪学者、伪国务活动家又以自己的鼓动与喧嚣使“苏维埃爱国主义”中的“非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感情膨胀和蔓延,使本应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苏维埃文化多了许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因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由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主持执行的“清洗”正高速进入“大清洗”的时期,斯大林对“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宣传就尤为炽热和频繁。他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使用“苏维埃人”这个概